

龙湾之战与元末建康水道

李新峰

【内容提要】 关于元末朱元璋部与陈友谅部的龙湾之战,以往研究信赖官方宣传材料《实录》,缺乏对战斗所在地建康城西水道格局的认识,对战役真相的了解和对双方行动的理解尚有深化余地。本文以明初俞本《纪事录》和武将传记等与《实录》对照,辨析、解释战斗过程,以现代地图与历代地方志记载对照,复原元末建康城西的水文地理形势,然后以地理状况进一步解释双方的策略与行动,以战况进一步验证所推断的水道格局,初步廓清了地理和战争两个领域的史实。通过这个细节论证,本文在发掘新材料、严格取舍与深入解读、不同领域史料间的对照互补等三方面,尝试拓展明初乃至明代前期史料的使用空间。

一、元末明初的旧材料与新视角

元至正二十年(1360)夏,陈友谅军顺江而下,兵临建康,朱元璋军在龙湾设伏邀击,大获全胜,史称龙湾之战。这是明朝建国历程中最凶险的

时刻之一,朱元璋军以寡敌众,一旦失利,江南红军政权势必全盘崩溃。出乎意料的全胜结局,使朱元璋部转危为安,一跃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势力,奠定了败陈灭张乃至一统全国的基础。明初的官私撰述特别是《明太祖实录》,对于这场战役的具体过程有浓墨重彩的记载,向来被记述、考订元末明初史事者瞩目,为深入了解战斗过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现代研究者对井井有条的记载出现了理解歧异。中山八郎、爱德华·德雷尔根据相关原始史料,对此战过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还原与推测^①,但所述过程的演绎成分较多,与史料原文有明显抵牾。台湾与大陆的军事史专家各曾探究双方战略、地利、兵力,进而对此战进行解读和图示^②,所述虽与原始史料一致,图示的路线、方位却有违常理、常识。可见,对这场战役的理解仍停留在文字叙事层面,未知其然,更未知其所以然。究其原因,一为史料记载单薄且不尽合乎事实,一为尚未了解与战役过程密切相关的建康城入江水道。明代《实录》来自起居注、日历等官方编年记载,最早的日历在洪武七年(1374)修成,记录“从皇上兴临濠、践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的内容。^③甲辰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以前,这个草创的政权只具备行省名义,不可能专设史官、施行起居注制度。所以,《明太祖实录》的早期记事,有大量应出自回忆,并非来自官方的即时编年记载,系统性与真实性均容斟酌。龙湾之战中的人物事迹关涉明朝建国历程中的内部政治斗争,遵循官方定论的《实录》尤其不可遽信,作为官方修史原料的《皇明本纪》^④以及宋濂等文臣所作武将传记大

① [日]中山八郎:《陈友谅の第一次回南京攻击》,《东洋史论丛: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京: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会,1964年,第447—472页;[美]爱德华·德雷尔著、张书生译:《明代的军事起源》,[美]年复礼等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2—85页。

② 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四册《陈友谅进攻应天作战经过图》(1:100000),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附图14—510;《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88页。

③ 宋濂:《宋濂全集·翰苑续集》卷五《大明日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74页。

④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七年(1948),第1、10页。王氏认为本书或为纂修《实录》时的修史原料,或为实录早期本的节录。按,本书言辞朴拙,绝非出自《实录》,记事止于洪武五年(1372)底,比日历只早一年,应即洪武初期的官方宣传品,为日历而非《实录》的修史原料。

体不出《实录》范围。与官方记载不合者,唯有明初老兵俞本的回忆录《纪事录》,明末钱谦益曾有征引^①,可惜此书清初即失传,钱氏摘录不具首尾,与《实录》不合的记载难辨真伪。所以,明初以来的撰述者和研究者所采信的,主要是不尽属实的《实录》等官方宣传材料。

幸运的是,俞本在20世纪70年代已重见天日^②,述龙湾之战的文字详于钱谦益摘抄者,前后之文提供了诸多相关信息,足资对照《实录》来考辨战斗过程。不过对明初而言,对常见史料的深入发掘比发现利用新史料更加重要,因为明代档案、文书、谱牒、调查报告等原始资料主要对应明中后期,《纪事录》那样的新发现更是寥若晨星,不足以改变明初史料的基本状况。明前期史料篇幅不大,头绪混乱,既难采用统计、对比、取样等方法,又难对关键材料进行细节分析和推断演绎。但是,若对庞杂的史料慎加取舍,剔除大量转述材料,则明初原始史料的头绪并不复杂^③,只要逾越了繁琐的头绪和矛盾的例证,大量间接证据就可供深入解读关键史料了。记载龙湾之战的史料,就提供了一个明初史料取舍与解读的范例。

当时,陈友谅水军远比朱元璋水军强大,陈氏船队若冲进建康城壕,就可稳操胜券,双方的攻守进退一定是围绕掌控建康城入江水道展开的,所以了解建康的入江水道格局是理解战役过程的前提。元末、明初、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近代,均有方志记载并图示建康城的水道状况,但是建康沿江水道格局的变化十分频繁,元末《至正金陵新志》与明初《洪武京城图志》的记载即有所不同,后来方志的文字与地图经常沿袭旧志,记载更是粗率零乱。研究建康水道者多重视秦淮河在城区的路线及变迁,于

-
- ① 钱谦益著,张德信等点校:《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9—90页。
- ② [美]陈学霖:《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元史论丛》第七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4—172页。
- ③ 杨讷等汇集元末战争史料,广征而严选,于龙湾之战独重《实录》、《纪事录》和四篇传记(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3—297页),廓清了史料记载的混乱局面。唯所据《纪事录》来自《国初群雄事略》的较劣版本,多有错漏,传记来自宋濂、金幼孜和黄伯生,其间取舍尚有推敲余地。

城外入江水道则往往简单标示,或以“达于江”一笔带过。^① 顾祖禹对入江水道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但苦无精确地图,只能就各条水道的名称分列史料。^② 牟复礼根据现代军用地图绘制了洪武时期的南京地区地图,爱德华·德雷尔绘制了这次战役发生时的南京地区示意图,均认真标示了入江水道,且彼此不同,可惜均未提供文字证据。^③ 石尚群等系统梳理了历代南京水道状况,所制南唐与明朝水道示意图精详可征,并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变迁,但对变迁的详细过程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前的水道格局未予深究。^④

现代大比例尺地图较精确地勾勒地形、标示地点,验证文字记载的能力远远超过顾祖禹可能寓目的示意图。南京地区的水系从明初到现代变化不大,但在20世纪发生了彻底变化,所以成图越早的现代地图,与明初的情况越接近。牟复礼采用了20世纪40年代的地图,石尚群等参考了1929年的图件,与此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南京地图兼收精确与示意之效,清末私人绘制的江宁府图标示尤详^⑤,更加便于推想元末明初的水道状况。

龙湾之战是在建康水道格局提供的可能性和限制下展开的,根据现代地图和陈友谅军的进攻目标、朱元璋军的防守重点以及双方的策略、行动,可以更加精确地推导方志语焉未详的水道格局,对水道格局的新认识反过来又能进一步解释史料记载中貌似不合理的战役进程。本文即拟以

① 最重要的著作为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明都城图”,《洪武京城图志 金陵古今图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89页;朱楔:《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2—36页。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应天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49—963页。

③ [美]牟复礼著,叶光庭译:《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编,叶光庭等译:《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173—174页;[美]爱德华·德雷尔:《明代的军事起源》,第83页。

④ 石尚群等:《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5—69页。

⑤ Gaillard, L., *Plan de Nankin (1898)*,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6 ([法]路易·盖拉德:《江宁府城图》(1898),上海:天主教会印刷所,1916年,实测比例尺1:14000);《南京1936》地图(1:20000),复制苏甲荣《最新南京地图》日新舆地学社民国二十五年(1936)印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

龙湾之战和建康入江水道的关系为例,探索军事与地理两个领域的史料记载互证、互补的可能性,拓展元末明初史料的使用空间。

二、战役过程的辨析与解释

《明太祖实录》记载龙湾之战,可分为定策、用计、设防、作战四个阶段:

庚申,陈友谅既僭号,乃潜遣人约张士诚来侵建康。群议,皆欲先复太平以牵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筑垒,濠堑深固。向使彼陆地来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舰乘城,遂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顺势来寇,舟师十倍于我,猝难敌也。”或劝上自将击之,上曰:“此亦不可。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亟回,非一日不至,纵能得达,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计,足以破之。”

于是召指挥康茂才,喻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陈友谅欲来为寇,吾欲速其来,非汝不可。汝与友谅旧,且佯欲为叛,遣人致书,约其来当为内应,彼必从。”茂才曰:“诺。吾家有老阉者,尝事友谅,颇信之,且忠谨不泄。具书令赍以往,则必达信,来无疑。”将行,以所谋问李善长,善长曰:“方以寇来为忧,何为更诱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为,久则患深,使二虏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虏,则东寇胆落矣。”遂遣阉者持书,乘小舸,径至友谅军。友谅见阉者,即呼问曰:“尔何为来?”阉者曰:“康相公令我来。”友谅曰:“康公何言?”阉者出书进之,友谅观书毕,甚喜,问阉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江东桥何如?”曰:“木桥也。”乃与酒食,遣还,谓曰:“归语康公,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阉者诺,归具以告。上曰:“虏落吾彀中矣。”

乃命李善长撤江东桥,易以铁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桥成。适有富民自友谅军逸归,言友谅问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筑虎口城,以兵守之。命冯国胜、常遇春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伏于石灰山

侧，徐达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帅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左，偃赤帜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则举赤帜，举黄帜则伏兵皆起。”各严师以待。

乙丑，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璟整兵御之。时水路狭隘，仅容三舟入港。友谅以舟不得并进，遽引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老康！”无应之者，始知閤者之谬己。即与其弟号五王者，率舟千余向龙湾，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其势锐甚。时暑酷热，上衣紫茸甲，张盖督兵，见士卒流汗，命去盖。众欲战，上曰：“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无云，众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赤帜举，上下令拔栅。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其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震，黄帜举，冯国胜、常遇春伏兵起，徐达兵亦至，张德胜、朱虎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兵披靡不能支，遂大败。溃兵走趋舟，值潮退，舟胶浅，卒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俘其卒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俞国兴、刘世衍等皆降，获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舸数百，友谅乘别舸脱走。于其所乘舟卧席下得茂才所遗书，上笑曰：“彼愚至此，诚可嗤也。”^①

按照《实录》记载，龙湾之战有两个关键环节，先是朱元璋成功地欺骗了陈友谅，使陈军连攻两处无功，钻进朱军的埋伏圈，后是决战时刻朱元璋审时度势，把握战机，一举得竟全功。这值得进一步推敲。

按《实录》所言，陈友谅轻信诈降，不谙情报，仓促无备，一副愚蠢透顶的形象，而朱元璋排众定策，力行奇计，设防埋伏，甚至预知天时以创造战机，智勇之状有如神助，这显然是胜利者的自我渲染。康茂才奉命诈降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年闰五月庚申、乙丑，影校明抄本，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2—105页。

之举,《皇明本纪》、宋濂、黄金皆有记录^①,细节各有参差,可知此事当非杜撰。可是,陈友谅为一代枭雄,说他相信敌营大将通款,把作战计划寄望于一封叛降信,无疑是对历史的小说演义化。陈军倾国而来,志在必得,建康为名都大郡,其水陆通道纵非为时人熟知,也必不难打探,陈军居然对进攻目标的水道宽狭、桥梁材质一无所知,居然征询不明来历的送信人和普通民众的意见,这也太近乎儿戏了。假如陈氏在江东桥下意识到中计,也会持重观望甚至暂时退兵,断不可能贸然深入下游。所以,陈军舰队先攻大胜港、再攻江东桥、后攻龙湾的行动,不可能是一个盲目试探、轻信中计、仓促应变的过程,而一定是在执行根据入江水道格局制订的合理计划。

对比之下,朱元璋军刚刚丧失了太平府,局面被动,只有固守建康一途,所谓收复失地或南下决战,最多是众将表现士气的姿态。正如朱元璋指出,太平府败于“巨舰乘城”,建康城壕深广,联通长江,想阻挡陈军,首先需把“十倍于我”的庞大舰队拒于城壕乃至入江水道外的长江上,然后寻机与登陆的陈军决战。所以,朱元璋的策略是唯一选择,即在各入江口驻兵坚守,在后方集中主力,随时开赴陈军登陆点决战。朱元璋以康茂才诈降,“告以虚实,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②,后来陈军果然连攻大胜港、江东桥、龙湾等三处,并不能证明陈友谅中计,只能说明这三处是双方公认的必争之地。

令陈军“分兵三道”,即诱使陈军从三条水道攻城,意味着朱军需要分兵抵抗,本来弱小的朱军更加不利。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谋划呢?大

① 佚名著,赵子富点校:《皇明本纪》,邓士龙辑,许大龄等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2页;宋濂:《宋濂全集·奎坡前集》卷二《蕲国公康公神道碑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357页;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九《康茂才》,《明代传记丛刊》第23册影印明正德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556—557页。按,宋濂为与战役同时代人,撰此碑铭犹在日历初修之前的洪武四年(1371),黄金撰文在弘治时期,均未参考《实录》,二人所记均非来自《实录》、《本纪》系统的史料,故可资对照。

② 宋濂:《宋濂全集·奎坡前集》卷二《蕲国公谥武义康公神道碑铭》,第357页

胜港由不甚重要的将领杨璟把守,江东桥更是无人防守^①,朱元璋显然既认为陈军会在这两处浪费兵力,又放心地放弃了它们,说明这两处并非通城大道。陈军连攻三处,其实在大胜港和江东桥既无象样的战斗,也未作认真停留。陈友谅与老閹者定约、富民被征询意见后得脱归,陈军又作出“分兵三道”甚至呼唤“老康”的举动,与其说是陈友谅中了朱元璋的诱敌分兵之计,倒不如说是陈友谅也根本没有寄希望于这两处,其行动是在将计就计,诱使朱军分兵南下,陈军主力则径趋龙湾。

双方都力求迷惑敌人而不成,最终还是要要在龙湾决战。按《实录》记载,朱军在后方的军队为驻石灰山的帐前五翼军,和驻南门外的徐达军,战斗打响后,陈友谅军聚集在龙湾岸上,朱元璋的守军、水军和这两支部队一齐上阵,“内外合击”,遂获全胜。陈军实力在朱军之上,登陆后“势甚锐”,接战之后却迅速一败涂地,若归因于朱元璋利用大雨,调度有方,恐未得要领。^② 亲历实战的俞本,则叙述了全然不同的战斗过程:

(陈友谅)遣其弟领大船侵应天府。及抵江上,见龙江城下,兵精将勇,城坚堑深,又创莲花椿于江濒二里许以拒舰。友谅船至,不能近城,友谅弟五王移海船于石灰山,其虎口城双刀赵之兵攻龙湾……

上调徐达、常遇春、邵荣领兵拒之。常遇春拒长张之兵于龙湾,邵荣拒五王之兵于石灰山,徐达驻中道,以待左右之援。数战不利,蔡镇抚率骑士数十在后,力战,俱死于阵。陈氏弃船赴敌,渐远,上调邵荣兵沿江而西截战。友谅兵前后不能相继,遂大败。长张船被风急水涌,不能开帮,率众俱降。上于石头城山上立马督战。天晴,盛暑,占者曰:“今日午时有雨,敌大败。”至其时,大雨如注,顷刻复晴,再战,大破友谅之兵。五王仅免,登舟而遁。败兵登舟不及,死者不可胜计,其被伤及死横于道者,兵不得行。生擒数万人……

① 杨璟出身元朝义兵,加入红军较晚,时仅任行枢密院判官(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九《杨璟》,第583—584页),远不足以独当一面;江东桥易为铁石,并不能作为工事,最多起震慑作用。要想抵挡舰队,还是需要守军。可是,不但“老康”不在,朱元璋干脆就没有在江东桥预留任何守军。

② 王崇武根据《皇明本纪》先雨后战的记载,指出《实录》是以预知阴晴的谎言来神化朱元璋(《明本纪校注》,第74—75页)。美化之事应无疑义,唯《皇明本纪》叙事与《实录》同源,仍宜以《纪事录》来对照《实录》。

先是,上于己亥年预料,敌兵临城,安能俱备,遂起溧水、溧阳、上元、江宁、丹徒、丹阳六县之民及作弊吏胥,自龙江至聚宝门,挑疏河道,阔五十余丈,深二丈,能容海船周旋。及谅兵至,海船悉泊于内,友谅不能获。诸将皆曰,此天祐上有此先见也。^①

俞本只是普通一兵,所见不如《实录》所载之全面,但作为亲历战阵者,俞本记载两军表现和战役过程的原始程度和可信程度,均超过《实录》。俞本记载的独特之处,在于说陈军于龙湾和石灰山两处发动进攻,龙湾由新降部众佯攻,在石灰山登陆的才是主力,朱军“数战不利”,但陈军主力深入后,“上调邵荣兵沿江而西截战”,一举扭转了战局。

邵荣为当时江南红军的第二号人物^②,后来被朱元璋诛杀,其事迹是明朝官方讳莫如深的话题。邵荣在石灰山与敌军主将对阵,所统率的一定就是《实录》所言埋伏在石灰山、由冯国胜和常遇春统率的帐前五翼军三万人。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3)回忆说:“当是时,吾伏精兵三万人于石灰山之阳,至斯而举旌帜,军如我约,一鼓而前驱,斩溺二万,俘获七千。”^③同年,宋濂作传记说:“友谅兵大至,兵阵既交,杀伤相当,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谅兵大败,擒戮无算。”又说:“上授诸将方略,设伏于险。赤帜一挥,伏甲尽出,大败伪汉兵。”^④他们都强调石灰山伏兵的关键作用,正如俞本所述,龙湾之战的决定性因素是石灰山伏兵袭击深入的陈军主力^⑤,而非朱元璋巧夺天时和诸军力战之功。

《实录》载水军先“出龙江关外”,又从长江里杀回龙湾,“内外合击”,实在匪夷所思,而俞本载水军躲在入江水道里,“友谅不能获”,应得

① 俞本:《明兴野记》卷上,庚子年五月“是月”,明天启刻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按,俞本原书名《纪事录》,今存明天启刻本妄改《明兴野记》([美]陈学霖:《俞本〈纪事录〉与元末史料》,第154—155页),故本文叙述称《纪事录》,征引时称《明兴野记》。

② 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89页。

③ 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阅江楼记》,《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初内府刻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16页。

④ 宋濂:《宋濂全集·奎坡后集》卷一《梁国公赵公神道碑铭》、《瀚苑续集》卷六《淮安侯华君神道碑铭》,第571、888页。

⑤ 爱德华·德雷尔误以为邵荣初战即被俘(《明代的军事起源》,第84页),所以对此后战斗过程的叙述和解释,与《实录》、《纪事录》均无法吻合。

其实。不过,水军将领的确多在龙湾之战建功,如张德胜“阵既交,杀伤相当。德胜乃从中大呼,麾诸将士奋击,友谅败走”,水军主将廖永忠“兵既交,永忠率所部大呼杀人,诸兵皆奋击,友谅败走”^①,水军诸将应是弃舟登岸,参加了对陈军主力的陆战。陆军将领中,在龙湾正面抗敌的常遇春、徐达其实无功^②,而冯胜“冲其中坚,败之于龙湾”,具体而言是“与诸将击友谅于石灰山,杀伤相当,胜率敢死士直冲其中坚,敌披靡,遂大破之”。^③石灰山伏军的决定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在龙湾之战的前半程,双方围绕三个入江口各用疑兵之计,均未成功,后半程决战中,陈军佯攻龙湾,主力迂回后方石灰山登陆,初获成功,旋为早已埋伏在侧的朱军主力所乘,一败涂地。换言之,双方都在用计,但朱军技高一筹。至此,战役的真实过程、两军行动的策略、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都得以明确,不过,只有成功地把史料记载的战役过程精确还原到地图上,才能从合理的文句上升到真相的复原。当时的入江水道,有且只有这三条并以龙湾水道为主吗?为什么双方都选定远离入江口和建康城、偏在一隅的石灰山,作为登陆和伏兵之所呢?史料中提及的各个要冲,能否给出现代的具体方位并与战况吻合?这需要暂时搁置关于战事的记载,从完全不同的史料来源去探究当时的地理状况。

三、宋元明变迁过程中的元末水道

历代地方志记载宋代以来建康的地理,比其他绝大多数城市详尽得多。明代中期,陈沂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图示历代城市、水道变迁,惜于

①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张德胜》、卷五《廖永忠》,第253、373页。

② 朱元璋为徐达亲撰神道碑铭,干脆不提龙湾之战,宋濂不遗余力地为常遇春铺陈战功,于龙湾之战则仅言“共谋击败之”(徐铉辑:《皇明名臣琬琰录》卷一《御制中山武宁王神道碑》,《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第一册第20页;宋濂:《宋濂全集·奎坡前集》卷二《鄂国常公神道碑铭》,第350页),可与俞本所记“数战不利”对照。

③ 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宋国公冯胜追封三代神道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9册影印明万历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8页;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冯胜》,第171页。

水道仍多粗略示意,于元明之间的区别未加详解。建康城西的长江淤刷无常,水道变迁极为繁复,地方志的记载实多讹误、矛盾之处,所以关于元末明初的水道,即使明中期人亦难明辨。石尚群等指出,南唐以后,“长江日益西移,秦准河口沙洲发育,导致了紧逼城西的夹江逐渐淤塞,但仍在地面上留下汉河、湖沼和池塘等遗迹。秦淮河则沿细流北上,经石城门至三汊河附近,沿今名惠民河的水道在老江口附近入江。”^①石氏所述是当代的秦淮河道,宋代以来秦淮河的改道与夹江的淤塞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当代与元明以前的情况可能不同。元末《至正金陵新志》和明初《洪武京城图志》是记载龙湾之战前后水道格局的主要史料,元末的情况可参考南宋后期《景定建康志》,明初可参考明代中后期志书记载乃至清代方志的初步研究,如果能梳理出水道从南宋到明末的主要变化趋势,更有利于判断龙湾之战时的水道格局。

在南宋方志的建康府辖境图中,秦淮河穿城而西,在白鹭洲与陆地之间的夹江出口处入江,入江口西北是茫茫江面;但在两幅附郭县境图中,原来的茫茫江面上出现了沙洲,秦淮河遂与南来的水道略呈十字交叉状。^②秦淮河出城向正西,即今汉中门到江东门一线,白鹭洲在建康城西,即今江东门西南的白鹭村一带^③,这应该是五代宋元秦淮河的主流。图中的新沙洲应该是宋代河口持续淤积的结果,所以县境图当更接近元明之际的情况。

在县境图中,白鹭洲与陆地之间的夹江是一条巨流,自板桥附近入陆,在毛公渡以北会秦淮河。板桥附近的人陆口应即今板桥镇西北的水

① 石尚群等:《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第66页。

② 《景定建康志》卷五《皇朝建康府境之图》、《上元县图》、《江宁县图》,《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76、1380页。在《上元县图》中,新沙洲似乎指江东门东北与当代秦淮河之间的陆地,但当时秦淮河能流至白鹭洲,必因江东门东北早已成陆,所以图中所示应是江东门西北新出现的沙洲。

③ 《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山川·洲浦·白鹭洲》,第1615页;朱俊:《金陵附郭古迹路线图》(1:100000),《金陵古迹图考》,末页;《南京市市区》地图(1:50000),《江苏省地图集》,江苏省地图集编辑组,1978年,第19页。

道入口大胜关^①,毛公渡在明初江东桥以南、驯象门以西^②,则此夹江在今大胜关北经沙洲镇至江东门一线。^③在府境图中,杨吴城壕向西南有一条岔流,在此夹江以东,两者必相通。同书又载,“新河,在白鹭洲西南,流通大江二十余里”^④,位置与夹江相当,但是仅仅“二十余里”,比板桥近得多,应是在白鹭洲南入陆汇入夹江下游的水道。由此,南宋后期通达建康的入江水道有二,城壕西北岔流约当今秦淮河干流^⑤,城壕西南汉流沟通夹江,新河横贯夹江与长江但不通建康城。

元代,水道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至正金陵新志》的山川总图中,秦淮河向北、向南两条紧靠陆地丘陵的入江河道与长江干流构成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内河汊密布,分出许多沙洲,其中最偏西临长江干流的为白鹭洲,靠近东南河道的为沙洲乡。^⑥偏北河道即原西北岔流,偏南河道即原西南汉流与夹江南段。同书记录了城市内外所有三个水路驿站的情况:

在城金陵驿:水站在正东隅……南至大城港水站六十里,北至龙湾水站三十里。

① 朱俟:《金陵附郭古迹路线图》(1:100000),末页。

② 《洪武京城图志》“街市桥梁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清抄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陈沂:《金陵世纪》“纪津梁”,《金陵世纪 金陵选胜 金陵览古》,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③ 《南京市 江宁县 江浦县》地图(1:250000),《江苏省地图集》,第20页。

④ 《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山川·河港·新河》,第1597页。

⑤ 秦淮河出城口向西直到江东门,乃至以西曾被明朝疏浚的地方,至清末仍有很明显的河湖遗迹(Gaillard, *Plan de Nankin* (1898) ([法]路易·盖拉德《江宁府城图》(1898));明代中期南京遭洪水,江东门至三山门可以行舟(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水灾》,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页),均可作为旁证。又,在上述府境图中,城壕向西北有一条岔流延伸到卢龙山一带,位于石头城、马鞍山以东。但是,这一带是连绵的丘陵,不可能有水道存在,而位于城、山以西的今秦淮河下游主河道,正是从杨吴城壕西北端向西北延伸出来,并迤迤而至卢龙山下的。秦淮河口沙洲发育,逐渐向北推移,必然在沙洲与江岸之间留下汉流,所以图中的西北水道,应上承城壕与秦淮河,在今秦淮河干流一线。这张地图是为凸显城区周围的水道形势与临江风物,而把西北水道和石头城的方向反置了。古地图为突出主题而扭曲方位者,不胜枚举。本文概取主题与方位相关者,以下辨析从略。

⑥ 张铨著,田崇校点:《至正金陵新志》卷一《金陵山川封城图考》,南京:南京出版社,1991年,第7页。

江宁县……大城港水站,在沙洲乡,去县三十里。

上元县:龙湾水站,在金陵乡,去县十五里。^①

显然,图中偏北河道就是通往龙湾水站的水道,秦淮河干流已经北移至此,龙湾必位于秦淮河口。沙洲乡东南的偏南河道就是通往大城港的水道,大城港本名大城冈,即明代大胜关港^②,必即《实录》所言大胜港和现代的大胜关。无疑,南宋夹江已逐渐淤积,不再是莽流巨川,所以元代以大胜港而非西南汉流通原夹江之处为入江口了。

南宋的新河在元代改称新开河,在《至正金陵新志》的驻防图与江宁县图中,大城港水道与新开河平行排列,各自联江。^③在《洪武京城图志》中,大城港水道与秦淮河的南北对峙格局与元末无异,但“三角形”中的河汊大为减少,在南北两个入江口之间只有一条河道向东北深入内陆,与大城港水道以两条河汊相连,主流则向北与长江平行,过江东桥汇入秦淮河下游。^④这个格局与南宋的根本区别是,偏西的新开河一线取代了偏东南的原夹江南段,成为新的夹江,其江东门以北部分至今可见。^⑤由此可知,元末的入江口有龙湾、新开河、大城港三处,原来的西北岔流延伸为龙湾水道,西南岔流延伸为大城港水道,新开河作为新的夹江,北入龙湾水道、南联大城港水道。在《洪武京城图志》另一张地图中,新开河过江东桥后,未至秦淮,先已入江^⑥,应该是沙洲淤积较少的早期情况。而到

① 张铨:《至正金陵新志》卷四《疆域志·铺驿》,第210—211页;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境内诸水图”,第96页。

② 《正德江宁县志》卷二《山阜附冈坳·大城冈》、《川泽·大江》,《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影印明正德刻本,第713、714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9、49页;

③ 张铨:《至正金陵新志》卷五下《山川志·河港·新河》、卷一《地理图考·益都新军万户府镇守地界图考》、《江宁县图考》,第247、17、18页。驻防图标明了各河道入江口的驻军名目,新开河与三山矶之间有一条与两者平行的河道和一支驻军未注名目,三山是自古以来建康西南方更远处的要冲,则此河道为大城港水道无疑。又,江宁县图放大了建康城西南的形势,大城港水道被视为一条贯穿南北的江流,新开河则是在沙洲群北部进入陆地,与大城港水道大致平行。

④ 《洪武京城图志》“京城山川图”,第5页。

⑤ 《南京市区》地图,第19页。

⑥ 《洪武京城图志》“楼馆图”,第8页。

明代中期,秦准河口已经形成了三汊河^①,即河口外沙洲进一步发育,秦准河与新开河夹江呈十字交叉状。元末明初的情况到底是这两种之一,还是两者交汇后沿秦准河干流方向西入江,或者沿夹江方向北入江呢?在整个明清时期,夹江水流的规模足够与秦准河抗衡,保持着三汊河的南北水道,并使秦准河的主流到三汊河后转向北,从草鞋夹入江^②,到清末甚至出现了三汊河向西的汊流淤塞的局面。^③从明中期开始,从西向东的新开河(宋元新河)淤塞不存^④,南北贯通的夹江上游仅存来自大胜港水道的汊流,连这样的水量尚能保持新强秦弱的局面,则元末以新开河为水源,强盛自不待言。所以,元末明初的秦准河口,应是秦准与夹江在今三汊河相汇后,向北沿今惠民河,在卢龙山以西入江。^⑤元末标龙湾在卢龙山或西或北^⑥,俞本称秦准入江水道为龙江,而《实录》提及的龙江关在仪凤门外^⑦,正当卢龙山西,无不为证。这样一来,新开河虽为夹江,却也算汇入秦准河的一支,其上游通江口也是建康城西的入江口之一。

总之,根据宋元明清时期的河道变化趋势,可知元末龙湾之战时的入江口有三个,其中秦准河口在卢龙山(今狮子山)西,新开河河口在江东

① 《正德江宁县志》卷二《川泽·大城港》,第714页。

②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明都城图”,第89页;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二〇《南直·应天府·新开河》,第956页。

③ Gaillard, *Plan de Nankin* (1898) ([法]路易·盖拉德《江宁府城图》(1898))。

④ 《正德江宁县志》卷二《川泽·白鹭洲》,第715页。按,同书卷首《县境图》仍标出一条与大胜关水道并行的新开河,显系承袭元代方志,故不取。

⑤ 明清时期三汊河向西的水道称下新河(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境内诸水图”,第96页),应上新河、中新河皆为明朝开挖疏浚者,元末尚无。

⑥ 张铨:《至正金陵新志》卷一《地理图考·金陵山川封城图考》、《旧建康府城形势图考》,第7、14页。《封城图考》标龙湾城于卢龙山东北,远离河口,《形势图考》则标龙湾于山以西,近河口,当以比例尺较大的《形势图考》为准。

⑦ 《大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应天府·关梁》,影印明天顺刻本,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按,若认为秦准河西流入江,就得把偏北的仪凤门外的大片空地解释为“出入长江边的必经之路”等等(权伟:《明初南京山水形势与城市建设互动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6、55页),但这是洪武初年龙江船厂所在地(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四《建置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页),在元末应是河流冲积而成的河汉纵横的沙洲,冲积者只能是秦准河,所以秦准河当时必系北流。

门西南方^①,大胜港河口与当代无异,水道格局与明初《洪武京城图志》所示最为接近,与元末、明中期方志所载多有参差。更值得重视的是,沙洲和夹江格局一直在变化,时称新开河、穿越江东桥的夹江在宋元时期尚非主流,明代中期以后则已湮废,只有在这时才处于河流发育过程中水流充沛、河道深广的时期。同样,夹江与秦淮河的关系,既非宋元时期的各自入江,也非明代中期以后的三汊河格局,更非现代的以秦淮河流向为主流^②,而是恰好处于河口发育过程中南北夹江强盛、入江口单有北流一处的阶段。一言以蔽之,龙湾之战时的水道格局只存在于历史的一瞬间。

四、战役过程与水道地理的相互验证

入江口有三、新开河可通航、秦淮河纳新开河入江,这三项基于方志记载的推测,能否进一步解释战况呢?

有且只有三个人江口,可以圆满地解释陈军的前期进攻行动。首攻大胜港,是尝试沿着宋元以来的大胜港水道直抵城壕西南角。次攻江东桥,是进入新开河后向北行驶,意图折入秦淮河后溯流而上,直抵西城壕。后攻龙湾,是想从秦淮河入江口直抵西城壕。

宋代以来,建康城西的沙洲不断淤高成陆,向西扩展,主要夹江汉流随之西移,从大城港水道到新开河,再到上新河、中新河等,直至当代更加偏西的夹江。大城港水道虽依傍陆上高地而有固定航道,号称“阴山运道”^③,但宋代以来水流必然持续减少,航道逐步萎缩,正合龙湾之战时“仅容三舟出入”的情况,所以双方均未真正重视。新开河作为当时主要的夹江,正处于水量相对充裕的时期,可容舰队行驶,所以双方围绕横跨新开河中段的江东桥斗智,佯为攻守。新开河与秦淮河在河口以西形成

① 上新河“在江东门外稍南五里通大江”(《大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应天府·山川》,第114页),当今上新河镇一带,则“流通大江二十里”的新开河河口,最有可能在今夹江北折的双闸至李圣村一带(《南京市图》,第19页)。

② 《南京1936》地图。

③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元集庆路图”、“境内诸水图考”,第87、97页。

了沙洲,秦淮河只有向北在龙湾附近的唯一入江口,而秦淮河与新开河交汇后水量较大,河口通往建康的水道又得到了疏浚,必可容大船通行,所以龙湾入江口既是陈军舰队的目标,也是朱军的防守重点。

从大胜港、新开河口到龙湾,到处是平整的滩头,但是水量较大的新开河横亘在建康西城壕与江岸之间,新开河东岸往北有水深河阔的秦淮河,往南有与大城港水道之间的多条河汊,这就消除了步军在这一带江岸或新开河东岸登陆攻城的可能性。只有秦淮、大胜港水道以东的丘陵和平地,才提供了走陆路去往建康城或者侧击入江口的通途,是陈军舰队不能近城时登陆的唯一选择。与从太平府方向由南向北进攻相比,迂回到龙湾以北,以东登陆具备起码的突然性,江岸高地则可成为登陆后指挥和巩固的制高点。所以,正是基于城西的天然水道屏障,双方陆军都放弃了在城西沙洲和城南大道的攻守,而来到城北丘陵地带决战。

三个入江口的存在、三条水道的不同水量、新开河水系形成的屏障,使得战役的焦点虚虚实实,最终落在秦淮河入江口与东岸紧邻的卢龙山。卢龙山南接马鞍、清凉、石头诸地,是建康城西北一线丘陵的北端,西扼河口,东瞰平地,必然成为陈氏水陆两军的合击目标。尽管朱军故布疑阵,多处布防,其实当时的水道体系已经消除了在其他地方决战的可能性,战役结局只取决于卢龙山的得失。陈军为此制订了最合理的计划,即偏师佯攻、主力迂回登陆、分进合击,朱军也认定陈军主力必然来争卢龙山,主力只能在龙湾下游登陆,所以朱元璋本人坐镇卢龙山,主力则大胆埋伏在貌似偏僻的卢龙山以东的石灰山南麓。这样,陈军主力的迂回恰恰进入了朱军的埋伏圈,尽管“甚锐”、“杀伤相当”甚至令卢龙山正面的朱军“不利”,最终还是在朱军主力的伏击下崩溃了。

上述经过梳理和解释的战况,能否反过来推测水道状况呢?

宋濂载赵德胜“守虎口城。虎口城,龙江第一关也”^①,似虎口城在龙湾。龙湾正面对抗的是长张所部,但是赵德胜此战并无大功。王祎载:

① 宋濂:《宋濂全集·蓑城后集》卷一《梁国公赵公神道碑铭》,第571页。

“庚子秋……相龙湾、虎口形势，筑二城以卫京师”^①，《实录》也载本年“筑龙湾、虎口城”^②，可见宋濂把二城混为一谈了，说明赵德胜所守虎口城另有所在，当在《实录》所言新河口。^③由俞本所记“其虎口城双刀赵之兵”，可知陈军先锋一度占领了虎口城，所以才有机会冲击江东桥。虎口城与龙湾城并列，可略见新开河的重要性。

《实录》载陈军入大城港后“遽引退出大江”，但到江东桥后没有提到“引退”，而至迟到明代中期新开河已经湮废了。有无可能当时新开河已经让位于“江东门稍南五里通大江……洪武初新开”^④的上新河，陈军是从长江干流中向东走捷径，“径以舟冲江东桥”呢？同治《上江两县志》即根据中新河简称新河，判断龙湾之战中的新河口即中新河口，为防御江东桥的前哨，陈军是从中新河冲向江东桥的。^⑤爱德华·德雷尔在江东桥北标出一条向西通江的水流^⑥，约当中新河一线，应即作类似判断。明代中期“白鹭洲少下阙南岸，以达江东门坝，为上新河”^⑦，可见江东门外的南北水流向西有坝，并不联通长江，上新河、中新河主要用作避风河港，均非水源^⑧，且晚至明初才开挖。所以，陈军“以舟冲”，应非沿上新河或中新河，当时一定存在着一条后代不熟悉的通畅的新开河。^⑨

古代秦淮河口在宋元以来淤塞，其正西干流有无可能当时还可以通航，新开河还是北流直接入江的夹江，龙湾之战的江东桥所指不是明初横跨新开河者，而是横亘在直通建康城的秦淮故道上？果如此，陈军会是从

-
- ① 王祿：《王忠文公集》卷二二《参军胡公行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8册影印明嘉靖刻本，第401页。
-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年十二月“是岁”，第110页。
- ③ 顾祖禹已经指出虎口城应在新开河上，唯未明言城与江东桥的方位关系（《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南直·应天府·江宁县·新开河》，第956页）。
- ④ 《大明一统志》卷六《南京·应天府·山川》，第114页。
- ⑤ 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四《考水》，第111页。
- ⑥ [美]爱德华·德雷尔：《明代的军事起源》，第83页。
- ⑦ 《正德江宁县志》卷二《川泽·白鹭洲》，第715页。
- ⑧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境内诸水图”，第96页。
- ⑨ 明代后期方志或以秦淮河干流为“宋元凿”的“新开河”（万历《应天府志》卷十五《山川·新开河》，第467页），或干脆以“新开河”为目照抄宋元方志“新河”条内容（万历《上元县志》卷三《地理·山川·新开河》，明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说明当时已经见不到宋元方志记载过的新开河。

新开河这条“大江”中攻击江东桥未果,沿江北上,进攻位于今三汉河一、带的秦淮河入江口的。方志的文字、地图均有信息滞后的问题,既然元末方志已经把古代秦淮河干流一带标为沙洲河汉,明初更是杳无痕迹,则龙湾之战时当已无航道。“新河口”可以跨水筑城,朱元璋在三年后救援南昌时“过新河口”^①而非出新河口,显然新河并非北入干流、常通舰队的夹江巨川。所以,江东桥的确是横跨南北流淌的新开河,联通陆地和向北延伸的巨大沙洲,新开河的规模不大。^② 陈军的确抵达江东桥并为石桥所阻,但陈军主力舰队并未进入新开河^③,朱军也未扼守这条通往秦淮河的河道,而且河上有一座可以迅速替换的桥。这说明,当时新开河的河道不算太宽,水量也没有大到令陈氏舰队视同长江干流。

明代中期到当代的地图,标示江东桥往南的水道已经不是新开河,而是向南偏东的细流,在西南城壕外与大城港水道相汇。明代中期的陈沂认为:“自三山门外达于草鞋夹,经江东桥出大城港,与阴山运道合者,皆新开河也。”^④明初新开河流经毛翁渡,而《洪武京城图志》载:“毛翁渡在聚宝门外瓦屑坝南……麾扇渡,后讹称毛翁渡,今名因之。”又载:“瓦屑坝,旧毛翁渡。”^⑤这些的确是西南城壕外的地名,有无可能明初已是这种格局,明初地图上的新开河只是大城港上游一带循江入港的小河汉,或者新开河一直向东延伸到西南城壕附近才北折南联呢? 战斗中,陈军进入新开河后向北抵达江东桥,而根本未考虑向东进发。如果新开河在南段汇入了大城港水道,陈军可由新开河径冲西南城壕,如果新开河离西南城壕不远,陈氏舰队可以直接登陆,威胁建康城。这说明新开河一定是早已在偏西地区北折,东以水量较小的汊流接西南城壕一带,即当时新开河与

①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年七月癸酉,第157页。

② 永乐时期的宝船厂位于今三汉河西南(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的点校出版——兼论龙江船厂遗址与宝船厂的关系》,《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南京,第17页),即当时新开河与秦淮河交汇口西南,可见明初此地已成陆,新开河并非独立入江。

③ 假如陈军主力进新开河,至江东桥受阻而退,《实录》必大肆宣扬。况且对舰队而言,一座石桥也不能构成真正的障碍,朱军也不会寄希望于陈友谅怕埋伏不敢前行。

④ 陈沂:《金陵古今图考》“境内诸水图考”,第97页。

⑤ 《洪武京城图志》“桥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9页。

大城港水道是各自独立的航道。^①《洪武京城图志》又载,瓦屑坝在西南城壕外的驯象门之外,其西的江东桥正南、新开河以西又有茅翁渡或毛公渡^②,并非西南城壕附近者,可为旁证。

至此,根据方志记载推测的元末明初水道格局,对陈、朱两军的策略和行动作出了圆满解释,双方围绕江东桥的微妙活动,又验证了对新开河流量、走向的判断,确认了对城西入江水道的认识,地理和战争记载提供了互补的史料。

五、结语

通过辨析《实录》记载和严加筛选的原始资料(主要为俞本《纪事录》和明初诸将的传记),可知龙湾之战其实并无太多曲折,只是一个合乎战争逻辑与地理条件的简明过程(见附图《龙湾之战示意图》):战前,陈友谅与朱元璋围绕进攻路线和防御重点较量计谋,战斗中,双方各施策略但均未奏效,在龙湾决战中陈军主力遭朱军主力伏击。陈军并非一开始就落入朱军的圈套,而是将计就计,执行了偏师佯攻、主力迂回的计划,但朱军技高一筹,以逸待劳,获得全胜。

通过分析历代方志的相关记载,剔除方志承袭前代的叙述,并以现代地图为准消除古代地图的示意、夸张影响,元末建康城西的入江水道格局得以展现:在南方大城港水道和北方秦淮河干流之间,存在着名为新开河的夹江,从新河口入陆向东北,向东南有汊流通大城港水道,主流则向北

① 清代后期的同治《上江两县志》已经注意到了明代江东桥正南正北有一条联通大城港的水道,认为即陈沂所述新开河(卷二七上《明应天府外郭门图》,《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同治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649页)。在其示意图中,大城港与联通处、江东桥相距很近,但其实两地相去甚远,不能证明元末明初的新开河上游来自大城港水道。

② 《洪武京城图志》“京城山川图”、“街市桥梁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第24,5,8页。《图志》的自相矛盾早在明代后期已有质疑(万历《应天府志》卷十五《山川·庵庙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3册影印明万历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68页)。

穿过江东桥会秦淮河。新开河的水量较大,秦淮河与之相汇后北折,在龙湾入江。这个格局在宋代以来城西沙洲发育过程中,只存在于元末明初这一个短暂时期。

水道格局圆满地解释了双方的策略、行动:大城港水道与新开河都可以通航近城,但水量有限,所以双方均佯为攻守,其实意在唯一可行的秦淮河干流。城西的新开河、汊流、秦淮河干流等形成了格外有效的屏障,要控制秦淮河干流就必须控制河口东岸的高地卢龙山。为此,陈军以偏师佯攻河口的龙湾,主力迂回到下游石灰山北登陆,占领滩头后进逼卢龙山。但朱军早已认清形势,在石灰山南麓埋伏了主力,待陈军初战告捷、战线拉长后突然袭击,大获全胜。

战况细节则验证了对水道格局的推测:双方围绕江东桥、新河口的微妙行动,既说明新开河的水量比正常夹江略小,又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与大城港水道不相混淆的、偏西的新开河,还证明当时必无上新河、中新河,也无可通城壕的古代秦淮河干流遗迹。

龙湾之战的真相和背景究竟如何,当时的建康城西水道究竟如何,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史实问题,但围绕这个问题的考证展示了充分利用元末明初史料的可能性。对头绪众多的史料的严格取舍(特别是舍弃大量后代转述)与深入解读(特别是对细节的合理化解释),不同领域的材料间的对照、互补,更新了战争与地理领域的认识。明初乃至明前期史料的规模,不足以与明中后期相比,而全面超越宋元,对此,以往研究稍微存在考证辨析不如宋元、分析利用不如明中后期的弱点。除发掘新材料、引入新方法外,加深对常见材料的解读取舍和对照互补,也是拓展明代前期历史研究视野的一个途径。

附:龙湾之战示意图



(李新峰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to Hedong
Circuit and its Operatio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Gu Liwei

Abstract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the Circuits (路) of Hebei, Hedong and Shaanxi, north of the Jingji Circuit in which the capital Kaifeng was located, formed a group of strategic defense regions directly facing the military pressure from Qidan and Xi Xia. The Hedong Circuit, though less directly confronting the enemies than Hebei and Shaanxi, possessed its own strategic importance. The military commission for the whole Hedong Circuit was in the prefecture of Bing, and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fronts in the region were combined into an integrated system centered around the prefecture of Bing. The Northern Song highly valued local forces. This particular aspect of the Northern Song military planning was also evident in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Hedong Circuit.

**The Battle of Longwan and the Hydrology
of Nanjing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by Li Xinfeng

Abstract The researchers on the battle of Longwan between Zhu Yuanzhang and Chen Youliang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have depended on official documents while neglecting the hydrology which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battle. This essay intends to rebuild the battle and the hydrology in the area west of Nanjing where the battle occurred by examining Shilu, Jishilu and biographies of the generals with reference to local records and modern maps. The historical data of early Ming Dynasty are explored and utilized in this essa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ways: new materials sought and employed, old materials more carefully reevaluated, and materials from different fields compared and complemented, in order to illuminate the strategic details and military plans in

the battle of Longwan in its geographical space.

**Theatrical Play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n the Inner City of Beijing:
Studies on Relevant Archival Data**

by Murakami Masakazu

Abstract In this essay, by using archival data,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the control of the Qing government over the drama activities. 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staging a drama was an activity closely superintend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ts actual policy and background have yet to be studied in details. Given the fact that archival data are one of most appropriat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se issu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many archival data such as the Grand Council transcripts of imperial memorials,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and the well-known *Shengpingshu Files* (升平署档案). With these important archival data, the author observe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rol over theatrical plays during Qianlong and Jia Qing periods, the collusion between Beijing opera theatres and the Infantry Commanding Office (步军统领衙门), and the drama activities of Qing imperial cla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the Militia and *Baojia* Uprising at Sichuan
Weiyuan in the Year 1909**

by Sun M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comprehensively relevant files and oral materials of the class struggle story passed down by generations, that is, the anti-Qing uprising of farmers and miners led by Tianbao Marshall Liu Xiangting.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the core protagonists of the uprising, in fact, were not